

## 金鉴才：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者

□ 李世俊

金鉴才，字明庐，号白峰。1943年生于浙江义乌，196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，196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专业。受业于潘天寿、吴弗之、诸乐三、陆维钊、朱家济、沙孟海、方介堪诸师，又尝问业于张宗祥、韩登安先生。现为杭州国画院院长，西泠印社副秘书长，浙江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，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



金鉴才先生近照



杭州国画院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。金鉴才老师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笃信者、传承者、躬行者的身份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践行着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文艺工作者“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、先行者、先倡者”。这段话无疑就是对金鉴才老师最准确的概括。

## 时代先觉者

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”杭州，是底蕴深厚的历史古都，是景色迷人的人间天堂，是文人墨客的流连之所，亦是我与金老师的结缘之地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于浙江美院（现中国美院）求学深造期间，有幸蒙金老师耳提面命，他既是我艺术修行过程中的老师，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。近几年，由于工作关系，聆听恩师教诲的次数再次增多，让我惊讶的是，纵然金老师已经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艺术大家，但他依然待人平和、真诚，一如当初精力充沛、随性幽默，依然葆有对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，在金老师身上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。

金鉴才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师出名门，17岁时便问道于吴弗之、潘天寿二位先生，入中国美院学习后，更是与沙孟海、陆维钊、诸乐三、朱家济、方介堪诸先生结下师生情，后又尝问业于张宗祥、韩登安先生。可以说，金老师承袭了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正脉，是中国传统文化“根正苗红”的传承人。

金老师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是自小便有的。众所周知，新文化运动后，由于白话文的推广，在一些陈年糟粕被剔除的同时，前人哲学、文艺精髓也随之而去，这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觉自愿学习传统文化的人越发稀少。而在金鉴才老师心中，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复兴中华传统的自觉意识。自少年时代起，传统的种子就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根，虽然他日后的学习之路经历了从文学到国画再到书法的转换，纵然也有过家庭困顿、基础薄弱、学习吃力的困难，但他克服了一切桎梏，始终浸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圈子里，未曾有过一刻的远离。他带着这样的初心，成为传统文化复兴事业的先觉者，并辛勤耕耘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，逐渐成为了当今少有的有信仰、有情怀、有担当且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印兼擅的艺术大家。

## 时代先行者

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，“知行合一”是中国古代文人修身治世的核心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基本命题之一，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“知是基础、是前提，行是重点、是关键”。

“以知促行、以行促知”向来是金老师为人处世的原则。为学为艺之人，若不将知见与实践进行结合，纵然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，又有何意义？因此，从美院学成后，金老师从未让

自己有一天闲过，除长期在中国美院等高校任教以外，他还曾供职于西泠印社、浙江省书协、浙江省文史馆等文化单位，并在西泠印社出版社担任了10余年总编辑的职务。道不可坐论，艺不能空谈，金老师一直以时代先行者的姿态，将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复兴大潮的第一线。

教师，是金鉴才先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。1985年至2015年，金老师在中国美院任教整整30年，退休后，教学事业也依然未曾停步。金老师教学很有一套，他总是能将复杂的书论、技法以生动的方式讲述出来，一言一语，看似平淡、随意，却蕴藏无上智慧。对于学生们，金老师总是不厌其烦、循循善诱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师者。

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，就要进行有价值的文化积累，编辑出版正是实现文化积累、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。金老师刚到西泠印社出版社工作时，沙孟海先生就特别强调：“出版是很重要的工作，要起好的导向作用、带路作用”。他自己也说：“责任心和牺牲精神是西泠印社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。”秉持着这样的精神传统，金老师十年如一日，辛勤耕耘，为书画艺术的传承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，先后主持编纂出版了《西泠艺丛》杂志以及《中国印学年鉴》、《梅兰竹菊历代名家技法大全》等令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图书，影响了一代学艺之人。

## 时代先倡者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掀起热潮，全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，此时的金老师对于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愈发强烈，“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”的浙江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。如今，年逾古稀的他，依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大跨步地走在时代的前列，成为文艺风向的先倡者。

传统中国画是一门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的独特艺术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门类都无法比拟的。而遗憾的是，五年前，作为中国画最发达的地区，浙江却没有一家专门的中国画院。缘此，时任浙江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的金鉴才老师，满怀虔诚与使命感，向杭州市委市政府申请批准成立杭州国画院，此举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经过深入考察调研与精心筹备，2013年5月，杭州国画院正式宣告成立，金老师担任第一任院长。

杭州国画院以“笃敬忠诚坚定文化自信，诗书画印推行国艺重光”为院训，以弘扬传统文化、振兴民族精神为宗旨。画院成立5年来，通过举办创作培训班、诗文书画课程、专题讲座等专业教育与普及教育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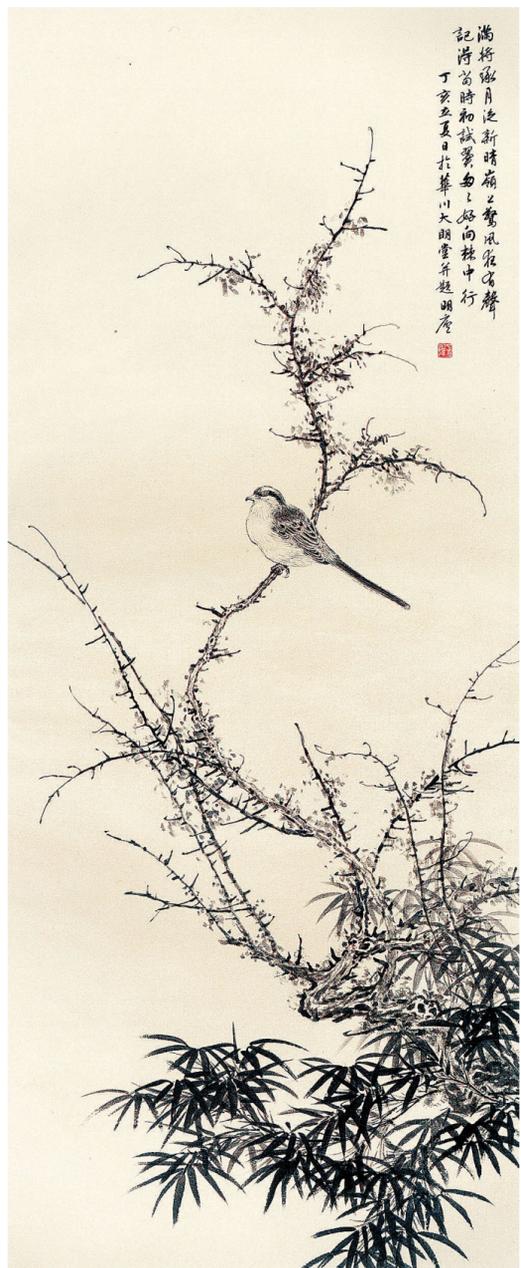
结合的方式，在培养一批全面发展的书画艺术人才的同时，也让广大群众感悟国学的精微和文化的力量。“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，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。”每年春节，金鉴才老师都会邀请书法家们书写成千上万个“福”字和上百副春联，向广大市民公开派送。他还在国画院内面向少年儿童实施中国画培训“播种育苗”基地，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中国画，爱上中国画，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。

金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谈道：“中华传统文化有雅俗之别。然而诗书画印在古代虽是雅的一类，却也只是雕虫小技，并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。三国时曹丕认为文章才是‘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’。由此可观，金老师的理想不仅仅限于诗书画印的复兴，他有着更大的格局，即通过倡导诗书画印，复兴民族文化，提振民族自信。”

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

气。”金老师深谙这一道理，杭州国画院成立后，金老师先后组织策划了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书法展”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”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法主题展览”“欢庆十九大诗书画印主题展”“向劳动者致敬：诗书画印主题展”等20余场充满正能量、极具时代性的展览，用栩栩如生、形象生动的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，用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去弘扬灿烂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，与时代同频共振，充分彰显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大局意识和时代担当。

金鉴才老师就是这样，不露锋芒也从未沉默，对于功名和利禄，他有着宠辱不惊的温和，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，他又有着义无反顾的执着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，他始终勇立潮头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、鞠躬尽瘁，实乃无愧于艺术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者！



金鉴才国画作品

我少年时有过一个美好的文学梦，却在16岁那年早早地破灭了。因为家境困顿，初中毕业后，父亲明确要求我报考不用花钱的学校，我于是不识深浅地投考了浙江美院附中。待到入学开课后才弄明白，这所学校虽然免费，却实在不是“省油的灯”，素描、水彩、水粉、国画、实用美术等专业课程需耗材料的费用，多次压得我差点辍学。又因自己绘画基础薄弱，学得也非常吃力。

附中第一学期就有国画课，我的第一幅国画就是临摹周昌米老师创稿的白描水仙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也没把那三片长长的水仙叶子画挺拔。国画难画！我只好选择离校参加工作，因为当时我确实看不出专业书法能有什么前途。而潘、吴两位先生却坚持叫我报考书法专业，潘先生还特别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真想学好中国画，五年书法是不会冤枉你的。我怕的倒不是你不想学书法，而是学了书法以后不想画画了呢。”正是由于先生的这一席话，自进入书法圈40多年来，我一直提醒着自己不可在中国画学习上懈怠下来。

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了书法热潮，而我因为有国内首届书法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身份，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。投放在绘画上的精力相对减少，有时书法界的好友偶然见到我的作画，还会开几句“和尚想吃道士饭”之类的玩笑。但我并没有放下画笔，只是把人物画放弃了，山水画则偶而为之，主要精力集中在花鸟画上。在与坤峰先生的交往中，我发现他的画已从多方向探索中逐渐压缩，开始了自身的优势整合，这是一个画家走向成熟的标志，而我对前路却茫然无从。

于是，我经历了近20年艰难的思索和寻觅。我回忆起1962年吴弗之先生画室中的一个场景：潘天寿先生一边站着观赏吴昌硕的画作，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：“可望而不可及，可望而不可及啊！”我请潘先生为我解析，他就指着画中的一片荷叶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墨色还像刚画上去似的，好像还继续在化开。”我当时深信不疑。现在细想起来，这只是他唯一能与一个附中学生说得明白的地方，而不是他“可望不可及”的主要内容。吴昌硕喜用羊毫，而且我听潘先生讲，曾亲眼见吴昌硕把蘸饱的墨吮蓄在口中，由于唾液的作用，所以画出的墨色格外丰富。潘先生曾师从吴昌硕，知道吴昌硕喜用羊毫，而且潘先生为什么反其道而用之，不用柔性羊毫，而喜用最刚硬的石籀笔呢？

1990年在浦江举行的一次吴弗之艺术研讨会上，吴楚堂兄提出“吴弗之是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艺术家”的观点。我表示强烈赞同。因为战垒的观点，一下廓清了我以往多次侍吴先生作画过程中一直无法释怀的疑惑：吴先生“大胆落笔”的良好开局有时为什么会“细心收拾”的过程中产生不理想的结局？结论应该是吴先生双重身份冲突的结果：他以诗人勃发的情感进入创作，而以教育家的理智收拾作品。二者各有所长，却终不可兼得。我的这番即兴感言，也立即得到了战垒兄的认可。

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：在艺术创作中，只能扬长避短，不能取长补短。后来作为一个观点发表在我一篇有关书法的论文中。

惜其中绝大部分后来被一位姓叶的东阳籍教师借去，始终要回不来。

附中毕业时，我倒是真心爱上了中国画，希望能上国画系学习花鸟或山水专业。当时在潘天寿先生主持下，浙江美院国画系正受命创办新的书法专业，花鸟、山水、人物专业都暂停招生，我只好选择离校参加工作，因为当时我确实看不出专业书法能有什么前途。而潘、吴两位先生却坚持叫我报考书法专业，潘先生还特别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真想学好中国画，五年书法是不会冤枉你的。我怕的倒不是你不想学书法，而是学了书法以后不想画画了呢。”正是由于先生的这一席话，自进入书法圈40多年来，我一直提醒着自己不可在中国画学习上懈怠下来。

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了书法热潮，而我因为有国内首届书法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身份，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。投放在绘画上的精力相对减少，有时书法界的好友偶然见到我的作画，还会开几句“和尚想吃道士饭”之类的玩笑。但我并没有放下画笔，只是把人物画放弃了，山水画则偶而为之，主要精力集中在花鸟画上。在与坤峰先生的交往中，我发现他的画已从多方向探索中逐渐压缩，开始了自身的优势整合，这是一个画家走向成熟的标志，而我对前路却茫然无从。

于是，我经历了近20年艰难的思索和寻觅。

我回忆起1962年吴弗之先生画室中的一个场景：潘天寿先生一边站着观赏吴昌硕的画作，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：“可望而不可及，可望而不可及啊！”我请潘先生为我解析，他就指着画中的一片荷叶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墨色还像刚画上去似的，好像还继续在化开。”我当时深信不疑。现在细想起来，这只是他唯一能与一个附中学生说得明白的地方，而不是他“可望不可及”的主要内容。吴昌硕喜用羊毫，而且我听潘先生讲，曾亲眼见吴昌硕把蘸饱的墨吮蓄在口中，由于唾液的作用，所以画出的墨色格外丰富。潘先生曾师从吴昌硕，知道吴昌硕喜用羊毫，而且潘先生为什么反其道而用之，不用柔性羊毫，而喜用最刚硬的石籀笔呢？

1990年在浦江举行的一次吴弗之艺术研讨会上，吴楚堂兄提出“吴弗之是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艺术家”的观点。我表示强烈赞同。因为战垒的观点，一下廓清了我以往多次侍吴先生作画过程中一直无法释怀的疑惑：吴先生“大胆落笔”的良好开局有时为什么会“细心收拾”的过程中产生不理想的结局？结论应该是吴先生双重身份冲突的结果：他以诗人勃发的情感进入创作，而以教育家的理智收拾作品。二者各有所长，却终不可兼得。我的这番即兴感言，也立即得到了战垒兄的认可。

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：在艺术创作中，只能扬长避短，不能取长补短。后来作为一个观点发表在我一篇有关书法的论文中。

（下转第五版）

## 中国画，我之所经历与思索

□ 金鉴才